

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文化使命

冯霞, 简智荣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不仅需要着眼于组织和制度的现代化建设,更需要立足于基层党组织的文化育人使命,以文化人,促进人的现代化。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文化使命包含三重进路:从国家发展的层面来说,需要通过提升社区民众的意识形态认同和制度认同以增进国家认同;从社会发展层面来看,需要通过培育社区民众的公共精神和重塑其个体观念以增进社区的公共交往;基于个体发展的视角,需要通过睦邻文化的塑造和社区情感关系网络的构建以满足社区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通过党建引领社区的文化建设,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基层党组织;社区治理;文化使命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3)04-0145-08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1](22)}。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在促进物质全面丰富的同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党的重要使命任务。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必须着眼于文化建设,实现文化育人并落实在人民的生活实践中。这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人是现实社会中的人,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总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受社会关系的塑造。在现代社会,社区是个体日常生活的场域,个体在社区当中进行政治参与和公共交往,受到社区文化环境的熏陶,与社区居民展开各种情感和文化往来。社区是塑造人、影响人发展的基础空间。因此,促进社区精神文化发展,以文化人,实现人的现代化必然成为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重要文化使命。

一、社区党组织文化使命的提出及其意义

(一) 社区党组织文化使命的提出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文化使命是新时代对基层党组织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2](59)},其中“德治”体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文化向度。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将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3](65)},这其中包含党对基层文化领导的使命。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1](67)},进一步强调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过程中包含文化建设在内的任务。

从既有研究来看,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的成

收稿日期: 2022-09-12; 修回日期: 2023-03-04

基金项目: 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建党百年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研究”(20AZD110);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文化路径研究”(2072021080)

作者简介: 冯霞,女,江西九江人,法学博士,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简智荣,男,福建漳州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联系邮箱: 1982714461@qq.com

果多集中在组织制度的重塑方面。一些研究强调基层党建通过发挥政治权威实现了整合基层党组织、协调基层主体关系的目的,认为社区治理以党建引领的方式实现了“超行政治理”^[4],建立了联结多元主体参与的枢纽型组织^[5],形成了“聚合性治理”“党建联合体”^[6]。另一些研究认为,党组织通过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体系嵌入基层社区,不仅提升了自身的基层治理能力^[7],还实现了党建引领社区的党员关怀机制、居民自治机制、权责能匹配机制等制度机制的创新^[8]。不难发现,上述研究都强调了执政党引领基层治理的政治使命,即执政党以超脱性的政治权威打破行政机制的常规运行,将自身的政治权力和权威下沉至基层,以达到整合基层社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的。

此外,有研究在探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困境的过程中发现,共识不足的问题制约了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提出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大众化的方式来引领基层共识的重塑^[9]。这实际上反映了基层治理对文化建设的需求,单纯的组织制度创新不能完全解决基层治理问题。还有一些研究从不同层面探讨了社区文化建设问题:有的关注了国家层面的文化建设,主张通过社区文化创建来增进基层民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10-11];有的关注了公共层面的文化发展,主张通过社区公共文化建设来强化集体认同,以促进社会公共交往和社区公共事务参与^[12];还有的关注了个体层面的文化需要,强调通过社区文化建设来满足居民的文化需求,愉悦居民的身心^[13]。

综上所述,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仅靠党建引领实现对基层的组织和制度嵌入是不够的,不足以激活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基层党组织还应当担负起基层社区文化建设、以文化人的使命,这也是破解当前基层党建引领存在的共识和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的必然选择。我们认为,在已有的社区文化建设研究的基础上,可以综合地从国家发展、社会发展、个体发展三个层面探讨基层党组织的文化引领的实践路径。人的现代化也正是从这三个层面得以推进的:在国家层面,增进民众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认同;在公共层面,提升基层民众的公共交往和公共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在个体层面,帮助基层民众积极吸收和谐健康的文化,丰富个体的精神世界,以满足个体的情感发展需求。

(二) 社区党组织承担文化使命的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14](44)}。基层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扎根基层的抓手,必须和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自觉担负起引领基层文化发展的职责,全面承担起文化建设的使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双百”方针的提出;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再到新时代的文化自信、文化强国,中国共产党始终对担负的文化使命高度自觉自为,基层党组织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工作经验,有能力担负起基层社区文化建设的使命。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要“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1](23,43,54)},这些都需要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去推进落实。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需要在基层社会得以巩固,增进人民对其的认同;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需要提升公民的公共参与自主性和积极性;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需要创建契合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由此可见,基层党组织必须主动担负起国家、社会、个体三个层面的文化引领使命。

基层党组织引领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国家层面来说,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基层治理,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资本主义文明是资本驱动的产物,其发展过程是资本的增殖、扩张过程,人被资本所奴役宰制,产生了一系列现代性弊病。中国之治的创新性就在于社会主义逻辑对于资本主义逻辑的超越^[15],因此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基层党组织主动引领社区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既可以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又可以增进基层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进而夯实中国之治的文化

根基。从社会层面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伴随着市场化、城市化的浪潮,传统单位制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瓦解,个体由集体人成了原子化的自由人。市场经济的冲击瓦解了传统社会的共同价值观,使传统社会个体间的有机团结转变为机械团结,个体主义、功利主义盛行,个体容易陷入情感异化、文化异质、共识匮乏的社会交往困境中,引发众多的社会问题。社区治理中存在的诸如车辆乱停放、环境脏乱差等问题看似与文化因素无关,却在深层次反映着公共精神的缺失、公共文化滋养的缺位。基层党组织主动培育社区公共文化,则可以使社区居民在公共文化的熏陶下,抑制公共交往中的自私、利己主义倾向,有助于社区公共精神的培育、公共利益的捍卫。从个体层面来看,现代人的生活主要限定在封闭的和人际关系冷漠化的城市社区,基层民众的情感交往式微,个体日益孤立化。个体的孤立使个体的情感与心灵缺乏依凭,归属感和认同感匮乏。社区作为个体生活的重要场域,需直面基层民众现代生活的困扰,基层党组织创造愉悦身心的文化氛围可以满足精神文化需求,丰富其精神世界,给社区民众生活提供情感依托。

二、社区党组织在国家发展层面的文化使命

社区党组织在国家发展层面的文化使命,集中表现为推进国家认同。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国家认同不仅是一种族群认同,更是一种文化认同。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1](43)}。这表明,在当代中国增进国家认同,就是要增进对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一) 坚持社区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增进对国家的意识形态的认同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领导者、建设者,自成立以来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

建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再造现代中华文明。这些努力只有深深扎根于基层,厚植于民众,才能转化为强大的现实力量。一方面,党引领社区治理的过程是党的组织网络下沉、渗透进基层社区的过程,也是执政党在基层建构政权合法性、引领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的过程^[16]。在这一过程中,基层党组织要通过“意识形态前置”^[17]的策略,不断提升不同群体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另一方面,在传统基层文化共同体瓦解后,现代城市社区场域中缺乏文化认同,各种亚文化相互交织,西方意识形态不断渗透。如果基层党组织不能实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引领,社区治理就有可能产生共识撕裂的后果,社区文化阵地有可能被封建势力、宗教势力、反社会思潮等占据。

社区党组织担负文化使命必须掌握文化领导权,引领主流意识形态、增进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基层党组织要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为整体文化奠定主基调,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底色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产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奉献精神”“劳动精神”^{[1](44-45)}等先进文化取向。这一过程是作为国家代表的执政党将自身文化价值灌输进社会的过程,集中体现着文化使命的社会主义面向。此外,引领社区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也是在夯实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层根基,因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增进基层民众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即是增进了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认同感。也正因如此,增进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这一文化使命坚定了基层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具有重要的文明意义。

执政党增进基层群众意识形态认同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是通过社区工作中的政治宣传教育。基层党组织向基层党员干部和社区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组织其进行理论学习,并做好舆论的宣传引导工作的内容往往由经典著作、学习材料、政策法规、中央文件等文本中的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所构成的。以“党的领导”“为人民服务”“先锋模范”等为代表的言语,

在本质上是承载执政党政治文化价值观的抽象符号,具备高度的政治性。其二是通过社区精神文明创建与社区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潜移默化灌输。这种方式本质上是通过一系列活动载体和物质载体承载意识形态,将抽象的话语转化为具体形象的活动和实物,因而更能深入人心。社区党组织可以通过精心设计社区文化广场、社区书屋、红色资源展览等物质载体,以及道德模范评选、志愿服务表彰、社区文化建设等活动载体,间接地传递党的意识形态,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增进社区民众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

(二) 塑造良性政治参与文化,增进基层民众对国家的制度认同

良性政治参与文化是人民群众在基层民主政治实践中形成的健康向上的政治意识、价值观念,属于微观层面的文化,且一经形成就会潜移默化地规范并引导民众的政治行动,促进政治参与的文明理性、和谐有序、积极自觉,使人民的利益诉求在政治参与中得以实现,从而在微观的政治参与层面实现对国家的制度认同。这种制度认同也是意识形态认同的重要支撑,基层民众正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与参与中,不断内化制度中所蕴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层次认同。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引领社区治理中面临着如何协调多元治理主体、如何平衡民主协商和秩序效率、如何激活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也都需要一种良性政治参与文化的引导。

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中国之治”的独特优势,这种“治”在基层文化建设方面反映着中国共产党在引领基层社区政治参与中的治理效能,以及随之不断生产的良性政治参与文化。党的基层文化使命意味着要自觉引领塑造基层良性的政治参与文化,不断彰显中国之治的优势。所谓良性政治参与文化是指合作型、协商型的文化,是指多元主体之间存在共同利益,可以在基层党组织的主导下进行协商、求同存异,展开合作,实现多元共治。与此相对的则是西方的竞争型参与文化,它的核心是强调利益团体的博弈与均衡,这种文化带有“弱肉强食”的特征,且常常导致政治极化^[18]。党的基层文化使命就是要塑造

出实现民主协商和秩序高效统一的良性政治参与文化,为中国之治夯实文化基础,在参与文化氛围下增进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效能感。

塑造良性政治参与文化的关键在于,基层党组织能够引领基层社区有序地进行政治参与,有意识地引领良性政治观念的形成,从而自觉建构起系统的政治参与文化,规范和引导主体行为方式。具体来说,政治参与文化产生于基层民主的协商过程,民主协商贯穿于基层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等各环节,基层党政机构、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居民等各方参与其中,主体间沟通交往的过程即是文化观念生产的过程。基层民众在民主协商过程中,能逐步形成以解决民生问题为导向、以求取共识为目标、以和谐团结为价值的共识信念。基层党组织所需要做的是,将这些不断生产出的共识信念进行体系化表达,自觉进行文化塑造和文化宣传,从而完成良性政治参与文化的塑造。

三、社区党组织在社会发展层面的文化使命

公共领域联结国家政治生活与个体日常生活,是个体与国家力量相互沟通的重要枢纽。在现代社会,公共性缺失问题不仅阻碍着政治参与的良性发展,滞塞良性政治文化的塑造,而且不利于个体的全面发展。社区党组织社会发展层面的文化使命,是需要唤醒基层社区的公共精神,超越个体自利的狭隘性,重塑个体观,在群己统一中打造社区公共性。传统个体观是在与他者的区分中确定自我,使个体与共同体陷入对立状态,这是公共精神缺失的深层次原因。新个体观应当在文化实践、交往实践中冲破个体与他者的二元对立,认识到个体间的共生共存、群己间的和谐统一。

(一) 培育社区公共精神,引领公共交往

公共精神是指个体关心公共事务,能够达成个体间的集体行动,正常有序地参与公共进行活动^[19]。公共精神处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框架下,秉持公平正义价值理念,怀有公共责任担当意

识。马克思指出,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已由“物质文明治理、制度文明治理”转向“以居民现代化为目标的以人为本治理阶段”。培育民众的公共精神,鼓励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使其在公共交往中超越个体的狭隘性,实现全面发展,这是个体实现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路径。公共性缺失是当前社区治理的突出问题,制约着社区的自治和公共事务的开展。这种缺失一方面源于现代社会中的个体主义盛行、功利主义泛滥、目的工具理性主导个体思维、交往理性缺失等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社区公共文化建设的缺失。公共精神无法自发形成,需要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建构,因此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必须自觉引领社区公共精神的培育。

公共精神是公众在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交往理性。与交往理性相反的是当前社会个体普遍秉持理性思维,在这种思维下,个体追求私利,主体间所呈现的是霍布斯所言的“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图景。个人只见私利,难见公意,会导致社区出现人际关系冷漠、对公共事务态度淡漠等现象。在公共精神所具有的交往理性思维下,公共意识将取代私利意识,个体将超越自身,关注到他人的利益和共同利益。公共精神的培养应具有三种载体:一是主体,即个体应当承担公共角色,例如个体作为社区代表、作为社区团体成员、作为社区集体活动的参与者等等,都需要处于一定公共关系之中,从事公共交往活动;二是活动载体,即社区必须有公共活动存在,如社区的选举、决策、管理,社区的文体活动等,使个体在参与公共活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巩固公共意识;三是空间载体,即需要一定的公共空间提供公共交往场所,使个体可以在其中协商管理公共事务、制定一定的自治规章等,为公共交往的展开提供空间基础。

公共精神构建的关键在于如何增进居民间的公共交往。基层党组织需要凭借庞大组织网络,联结各类主体,为公共交往提供可能性。社区党组织可以以党建为切入点,将党群联络室等党建基础设施转化为社区公共交往的场域,将各类党建活动转化为社区公共交往的载体。一方面

在公共场域里坚持社区民生问题导向,召集居民就社区公共事务进行诉求表达,主持不同主体间的对话协商,在公共参与训练中生产公共精神;另一方面在公共场域进行公共文化建设,党组织牵头举办喜闻乐见的党建文体活动、社区志愿服务活动,供给公共文化和公共服务,潜移默化培育社区的公共性。此外,作为公共精神的重要依托,基层党组织要引导社会组织发育,将社区居民组织调动起来,对居民进行现代公民教育,通过宣传学习活动提高居民的参与能力。

(二) 重塑个体观念,引导个体与共同体和谐统一

建构公共性的根本在于超越个体主义的狭隘性,重塑个体性,使个体与共同体实现有机统一。如果说公共精神构建是公共文化使命的共同体逻辑,那么促进个体全面发展就是公共文化使命的个体逻辑。构建公共精神除了要正面建构公共文化之外,还需从根源上重塑个体文化,使个体具备公共性。促使个体全面发展的意义在于,使个体冲破单向度,以主体间性取代个体孤立性,使个体成为相互联结的个体,由此具备公共性。在市场逻辑下,个体深受物化结构影响,日益成为单向度的人,社会关系全面异化。所以,现代化的社区治理需要通过党的基层文化建设来治愈个体主义的弊病:建构社区公共文化,为孤立的个体提供共同体依凭,使其在社区共同体中获得全面发展。

社区居民个体的全面发展,一方面意味着在社区的公共交往实践中,个体居民会摒弃功利思想,通过协商求同存异,在集体行动中以主体间性取代个体孤立。在社区的公共文化环境下,居民个体通过协商参与充分表达个人的诉求,不仅会使其利益诉求获得集体依凭,使其集体参与能力、协商能力、交往能力等得到充分的训练,还可以使其增添集体认同、树立责任意识。另一方面意味着在社区公共文化的浸润下,个体居民的思想境界得到全面提高,会将社区看成是相互联结、和谐统一的集体,进而将个人的利益追求和社区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社区共同体构建的关键是塑造居民间相互依赖的群己关系。一方面,要充分重视居民个体

的利益和其自我实现的需求。社区党组织需要通过组织主题党日的教育宣传、社区文化建设等活动,为居民个体的全面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另一方面,要把社区居民看成共同体,通过党组织引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在个体诉求表达和社区公意形成的过程中,认识个体利益的实现与共同利益的发展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基层党组织需要通过党建活动,宣传引领互依性群己文化,克服居民的个体功利主义。具体来说,社区文化建设要以党建为契机,开展树立先进典型、道德模范评选、文明创建等活动,引导居民树立正确的群己观。

四、社区党组织在个体发展层面的文化使命

现代社区治理要致力于实现人的现代化,以人为本,不能仅限于注重组织制度的优化,还必须重视个体居民的情感体验,满足个体居民的精神发展和情感需求。社区党组织个体层面的社区文化使命主要是立足于日常交往,奉行生活化逻辑,重视个体居民的情感体验。提升个体的精神境界有两重进路:一是要塑造睦邻文化,在生活场域中给予个体精神归属;二是要培育社区居民间的情感关系网络,搭建个体间的情感纽带,使个体在交往中,满足自身的情感需求。

(一) 塑造睦邻文化,提供个体精神依归

古代基层是以村落宗族为单位,是敦亲睦邻、忠孝节义、守望相助、安定和谐的血缘宗族共同体^[21]。个体在其间互助互惠,生活风险得到分担和化解,个体的情感需要得到充分满足。这种血缘文化共同体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被逐渐瓦解。在充满流动性的社会里,个体缺乏情感依凭,对社区无法产生归属感,由此制约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因此,再造睦邻文化、满足居民情感需要、为个体居民生活分担风险刻不容缓。再造不是对传统睦邻文化的简单再现,传统的睦邻文化存在一些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契合的价值观。再造意味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现代问题为导向,对传统睦邻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

再造睦邻文化,一方面,要对传统的忠孝节义等文化成分进行创造性转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与时代问题相适应。例如孝文化可以向养老文化转化,使之服务于当今社会老龄化,作用于社区养老。另一方面,要结合现代化需求等对传统睦邻友好、守望相助等文化成分进行创造性发展。例如,利用社区志愿服务等为守望相助注入新内涵。睦邻文化旨在消除城市社区当中的人际关系陌生化,以和谐邻里关系和邻里文化克服现代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异化,舒缓个体面临的现代性困扰,为个体提供情感寄托。由此可以塑造柔性的情感文化环境,减少功利文化的影响,弥合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和共识间隙,缓解个体间的矛盾冲突,创设和谐稳定的社区生活环境。这种情感纽带和和谐关系的构建,对于塑造互依性群己关系、建构社区公共性、促进个体全面发展、增进居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等都能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

城市社区无法自发形成睦邻文化,基层党组织需要以党建活动为引领,自觉塑造现代睦邻文化。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厦门工作期间居住的深田社区就是在基层党建的引领下,开展社区志愿服务,守望相助,逐步形成了“远亲不如近邻”的“近邻”文化。塑造现代睦邻文化,一方面,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宣传传统的优秀睦邻文化。例如结合社会主义的和谐价值观,通过创办和谐文化长廊、开展和谐文化主题举行党建活动等,宣传传统的和谐文化、睦邻文化。另一方面,需要通过现实活动载体塑造社区集体情感体验,不断为睦邻文化注入现代内涵。例如通过打造社区养老品牌、举办重阳节节日庆典、帮扶关爱社区孤寡老人等,倡导尊老敬老,推动传统孝文化向现代养老文化的转变。同时以对弱势群体的关爱为切入点,为社区居民注入温情的情感体验。此外还可以依托社区广场舞、社区结对帮扶、社区兴趣社团等交往实践,使个体居民在日常生活交往中生产情感,以推动社区睦邻文化的形成。

(二) 构建社区情感关系网络, 满足个体情感需求

文化需要基于持续性的实践才能不断发展创新建构。睦邻文化给予社区居民个体精神归属, 但是睦邻文化需要依托情感纽带维系, 才能不断再生产。所谓的情感纽带, 就是社区的情感关系网络, 它内嵌于社会人际关系结构当中, 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表现出来, 可以促进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合作。现代城市社区普遍面临着社区居民公共活动参与不足、社区认同缺乏等问题,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代社区生活使用居民缺乏情感纽带, 换言之, 社区社会资本存量不足, 社区居民更多的是一种地理空间上的机械组合, 而不是情感心理上的有机团结, 因而难以自发形成集体行动。情感关系的缺场, 会使情感文化的塑造丧失主体间性, 无法构建个体间的情感网络, 从而成为一种形式上的文化创建活动, 无法深入个体的情感世界。

社区情感关系网络培育的具体目标是打造社区熟人社会, 构建社区社交网络以联结不同的家庭住户, 帮助社区居民营造守望相助、远亲不如近邻的情感体验, 生产出信任、共识、认同、互惠的社区交往规范。这一情感关系网络强调的不是社会普遍意义上的人际交往, 而是社区生活场域中的日常亲密往来, 要以日常互惠的情感体验为基础, 以生活交往中形成的情感纽带为关联, 编织社区情感关系网络。具体来说, 社区情感关系网络培育需要一定日常交往空间作为基础, 因为交往总是在一定物理空间中进行; 需要以情感卷入和身体卷入为两翼, 以营造社区集体欢娱实现居民情感卷入, 以组织社区团体建设实现居民身体卷入; 需要以持续性互惠行动为情感加深找到突破口, 实现居民身体情感的双重卷入。社区情感关系网络提供的信任和共识可以冲破人际隔阂, 降低个体间的协商成本, 促进集体行动的形成, 有助于社区公共性建构和自治水平的提升。所内蕴的主体间性和交往逻辑, 有助于缓和个体间存在的矛盾冲突, 对于树立交往理性、促进现代交往和谐发展、实现人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 只有频率足够高的交往才能搭建起个

体间的情感纽带, 实现熟人化, 特定的空间安排才可以为日常交往创造更多的机会。因此基层党组织要注重党建场所在日常中的社交功能, 打造社区花园、党群活动室、阅览室等交往空间, 提供必要的休闲娱乐设施, 为居民日常交往接触创造条件。其次, 身体卷入和情感共鸣可以拉近个体间的心理距离, 跨越熟人门槛。基层党组织可开展一些大众通俗的党建活动, 如广场舞、美食节、社区节日庆典等, 帮助社区居民的集体欢娱。同时从兴趣社团入手, 引领社区团体的组建, 加深居民间的日常交往。最后, 居民互惠可以带来自我实现感和日常生活的温馨感, 分担现代生活中的个体风险, 真正塑造出守望相助、远亲不如近邻的行为规范和情感体验。社区党建可以发挥党员模范作用, 引领社区志愿服务队伍创建和爱心活动的开展, 如党员爱心义卖活动、“春苗计划”的爱心午餐活动、“红袖章巡逻队”、帮扶弱势群体等, 从而引导居民间的互惠行动。

五、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和国家愈加重视基层治理, 国家治理重心不断向基层下移, “党建引领”成为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路径和基本逻辑。进一步探讨“党建引领”中所应践行的文化使命, 主要有四重意蕴。一是以文化治理丰富“党建引领”内涵。“党建引领”不仅意味着对基层组织和制度的重塑, 还意味着引领基层文化发展, 主动塑造人民群众的主观世界, 以文化人, 激活人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自主性。二是以人的现代化加深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仅仅意味着实现制度的现代化, 更为根本的在于实现人的现代化, 要增进人民美好生活体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只有作为治理主体的人实现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才能真正现代化。三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大局拓展基层治理视野。基层治理情境绝非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大局无关的纯粹技术性事务, 基层治理中的文化使命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的以人民为中心、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等价值规定。基层治理要超越单纯行政管理、

治理技术视野,拔高站位,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相贯通。四是以文化使命彰显“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西方治理受资本逻辑主导,物质主义盛行,文化、情感异化,个体缺乏健康文化滋养。“中国之治”秉持社会主义文明导向,在基层社区践行国家、社会和个人发展三个层面的文化使命,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丰富了人民精神世界,同西方治理情境中的个体异化形成鲜明对比,展现了“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

参考文献:

- [1]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2]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 [3]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 [4] 彭勃, 杜力. “超行政治理”: 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J]. 理论与改革, 2022(1): 59-75, 156-157.
- [5] 岳经纶, 刘洋. 党建引领社区善治的逻辑——基于浙江省N街道的研究[J]. 治理研究, 2021(5): 59-69.
- [6] 陈秀红. 整体性治理: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一个解释框架[J]. 学习与实践, 2021(12): 93-102.
- [7] 周艳玲, 董航宇, 唐云霓. 党建引领、嵌入与联动: 基层社区共同体构建——以J社区365协商议事厅为例[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6): 69-75.
- [8] 吴岚波, 原珂. 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进路与制度变迁[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22(1): 13-22.
- [9] 全林. 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1): 115-125.
- [10] 康雁冰, 林春逸. 社区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探索[J]. 广西社会科学, 2017(3): 189-192.
- [11] 解红晖, 金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路径探微[J]. 湖南社会科学, 2016(3): 34-37.
- [12] 颜玉凡, 叶南客. 认同与参与——城市居民的社区公共文化生活的逻辑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19(2): 147-170, 245.
- [13] 郑广永. 论城市社区文化的功能及限度[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1): 87-93.
- [14]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15] 毕照卿, 张占斌. 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逻辑的驾驭与超越[J]. 思想教育研究, 2023(1): 10-16.
- [16] 潘泽泉, 辛星. 政党整合社会: 党建引领基层社区治理的中国实践[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2): 153-163.
- [17] 颜玉凡, 叶南客. 文化治理视域下的公共文化服务——基于政府的行动逻辑[J]. 开放时代, 2016(2): 13-15.
- [18] 徐理响. 竞争型政治: 美国政治极化的呈现与思考[J]. 社会科学研究, 2019(6): 16-23.
- [19] 韦仕祺. 公共精神的失落根源与矫治[J]. 人民论坛, 2019(24): 54-55.
- [20] 高磊. 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下的邻里关系重建[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4): 8-13.

On the cultural mission of Party-building leading community-governance

FENG Xia, JIAN Zhirong

(School of Marxism,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Party-building leading community-governance needs not only to focus on the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system, but more to be based on the cultural mission of the grass-root Party organizations, to civilize people with culture and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people. The cultural mission of Party-building leading community-governance involves three practical approaches. At the national level, it is imperative to strengthen national identity by upgrading ideological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al identity. At the social level,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public interaction by cultivating public spirit of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by shaping individual concept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it is necessary to meet individual spiritual needs by shaping a neighboring culture and by structuring a network of community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ultural mission of p Party-building leading community-governance is of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and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grassroot Party-organizations; community governance; cultural mission

[编辑: 游玉佩]